

唐通事与汉语言文化在日本的传播¹

朱 勇

提 要

江户时代(1603—1687)唐通事作为江户时代中日交流的媒介,在中日语言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唐通事的职责主要是口语翻译。他们在中日交流史上作用很大,但地位并不高。唐通事的汉语学习带有家庭教育性质,学习具有工具性动机,学习方法多从经验出发,虽具一定科学性,但离科学的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还有很大的距离。唐通事对江户时期及以后的汉语教育有着广泛的影响,他们的语言学习和教育活动促进了汉语和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在中日交流史上,江户时代跟以前有所不同。比如隋唐时,日本主动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学习汉语、汉文化及佛教等,而江户时代,日本闭关锁国,禁止日本人出海航行,这样就使得江户时代的日中关系在整个日中关系史中处于很特殊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物产,完全通过中国人传入日本,与以前日本人去中国学习文化、带回物产的交流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²在这一时代,中日语言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是从事中日贸易的唐船,而唐通事作为中日交流的媒介,从事中日贸易往来间的口语翻译工作,所以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了后继有人,唐通事们往往将汉语传授给子弟,后来也逐渐传给外人,这是江户时代日本人学习汉语的大的背景之一。对于唐通事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江户时代日本的汉语教育情况及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的情况。

一 唐通事的职责和地位

1. 主要职责是翻译

¹ 本文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重点项目“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子课题,感谢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帮助。

² 大庭修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页8,中华书局,1997年。

胡双宝认为,唐通事的任务“主要是教授唐话”。³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史实的。如前所述,唐通事的主要职责应该是翻译。此外,他们还负责来航唐船的管理、有关买卖的账簿和报告的制作、对外交易决策权的行使、唐人唐馆秩序的维护及唐船风说书的听取报告等。⁴

其实唐通事的职责归根结底要从其产生的历史原因来谈,唐通事这一职业的产生,它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中日海上贸易的兴盛,大量唐船来到长崎,可是中日语言不同,所以必然需要翻译,于是唐通事作为中日语言的翻译应运而生。当然,唐通事在其产生之初和发展过程中,职责范围可能会有变化,但就资料而言,其主要职责是口头翻译无疑。详细论述还可以参见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的有关章节。⁵

2. 社会地位不高

至于唐通事的社会地位,刘小珊认为,“唐通事当时作为一种官职,地位很高,在当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⁶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结论并非如此。安藤彦太郎指出,“当时长崎据说有几十名唐通事。他们在与清国进行通商事务上虽拥有权力,但地位很低。他们所掌握的明清时代的平民的教养虽称之为崎阳之学,但并不被看作正式的学问。唐通事冈岛冠山也自嘲地说,崎阳之学不过是裨官之学(小官吏的学问)。”⁷石崎又造对此的论述也非常明确,他说,“当时日本研习儒学的人对崎阳之学(即唐话)持一种歧视的态度,儒学视其为卑俗”。⁸

此外,笔者还发现江户时代著名学者冈岛冠山所编的汉语教科书《唐话纂要》中,林崇节作的序也提到唐通事的地位问题,序言里是这样说的,“古之象胥,今之通事也。盖通事之职,不可国而无之者也……然而通事之职,未足以为贵也,朝间有重礼之士,不肯补此职者,不亦宜乎?”“兹有冈岛玉成子者,精通华之声与语也……然弗补通事之职,而游乎江湖者,无乃憎嫌此职之不贵邪?”⁹前一句意思是,翻译人员在古代叫做“象胥”,现在叫做“通事”。通事这个职位是国家所不能缺少的……可是,大家并不觉得通事地位高,很多有识之士不愿意从事该职业,也是自然的。后一句意思是,冈岛冠山先生精通汉语……可是他不愿意从事通事工作,而是游历江湖,原因不也是觉得通事地位不高吗?

³ 胡双宝,读威妥玛《语言自述集》,《语文研究》2002年第4期。

⁴ 刘小珊,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⁵ 大庭修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页8,中华书局,1997年。

⁶ 刘小珊,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⁷ 安藤彦太郎著,卞立强译,《中国语与近代日本》,页5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⁸ 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页28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⁹ 该书初版于1716年。“这是明治以前出版的最完备的问答体教科书,可以说是唐通事的经验和知识的精髓。”见安藤彦太郎著,卞立强译,《中国语与近代日本》,页5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从上述来看, 尽管唐通事在江户时代的中日交流史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其社会地位并不高。那么唐通事地位不高甚至地位“卑俗”的原因何在呢? 这跟当时社会推崇儒学以及汉籍阅读中的“目读主义”不无关系, 很多饱学之士认为不必学习唐话照样能成为大儒。这应当是其最根本的原因。因为“当时汉学的中枢是研究儒学经典, 以幕府的大学为代表, 讲授的主要是经学, 经学才是当时的学问。”¹⁰

二 唐通事的汉语学习

1. 具有家庭教育性质的民间学习

唐通事的汉语学习具有父子相传的特点, 唐话的传授对象多为子弟, 带有一种家庭教育性质。唐通事们像传授一门手艺、一种技能那样, 把唐话传授给自己的下一代。所以说, 唐话的学习不具有官方性质, 多是自发的传授和学习, 是一种民间的汉语学习。¹¹唐通事这一职业最初设立时, 一般从来日的唐人(中国人)中物色。最早从事该职业者有冯六等人。¹²唐通事是可以世袭的, 所以唐通事们的子弟从小就开始唐话学习, 这也是唐通事汉语学习之所以带有家庭教育性质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学习动机主要为谋生

跟其他的汉语学习不同, 其他的汉语学习活动只是学习中国思想文化的附属产物, 甚至并没有把汉语当作外语来看待,¹³而唐通事的汉语学习则是以会话为主, 为了谋生的需要而进行的。高希朴仲在《唐话纂要》的序中指出, “夫崎阳者, 其地濒海, 跨唐一苇。贾舶商船, 舳舻相接。职译官此, 岁致千金。故其土人士, 户学人习。”¹⁴意思是, 长崎这个地方靠海, 离中国很近, 做生意的船只很多。在这儿做翻译工作, 一年可以挣不少钱。所以当地家家学习汉语、人人学习汉语。

¹⁰ 六角恒广著, 王顺洪译, 《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 页 264,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年。

¹¹ 本文的“汉语”和“唐话”可以互换使用。此外, 唐通事作为一种职业, 它也由高到低分为不同级别。为了行文方便, 本文将那些处于“学习、实习和正式”等不同阶段的通事统称为“唐通事”。

¹² 严绍璦, 十七—十八世纪日本人汉语学习考略, 见李向玉、张西平等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第一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澳门理工学院, 2005 年。

¹³ 钱婉约指出, 从历史上看, 中日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血亲关系, 日本历史上向来对中国语言文字抱有“同文”的观念, 因而“汉文”对于日本人来说, 不是一种外语, 而是本国语言文化的一部分, 是本国人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标志。见钱婉约, 论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发展的曲折性, 载李向玉、张西平等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第一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澳门理工学院, 2005 年。

¹⁴ 冈岛冠山著, 六角恒广编, 《中国语教本类集成补集: 江户时代唐话篇第一卷 唐话纂要》, 日本不二出版社, 1998 年。

由此不难看出，唐通事们的汉语学习具有很强的谋生的动机。

江户时代以前，日本人掌握中国文化主要是靠阅读中国文言经典著作的方法。后来，日本学者创造了“训读法”来阅读汉籍。所谓“训读法”¹⁵，它不是按照汉字的读音注释假名，而是根据注释者理解的意义，按照日语的语法重新标注语序，并附有助字和活用字。这就使汉语水平不太高的人也能读懂，为那些阅读汉籍而又不通汉语语法的日本人，提供了一条捷径。训读的结果就是他们只能“目读”汉籍。而唐通事的出现及“崎阳之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语口语的学习，也引起了知识界对“目读主义”的质疑。

江户时代日本的大思想家荻生徂徕认为，要掌握汉语“原文的意思”，必须学习中国语，抛弃“训读”。因为只有掌握了汉语的读音才能真正进入汉语、汉籍的语境。他“主张按汉文的音读来通读古典，并学习了中国音，在汉学的内部掀起了革新的浪潮。”¹⁶

3. 汉语教学方法

唐通事们对汉语教学的认识多从经验出发。比如，关于学习的年龄，雨森芳洲语：“通词家咸曰，唐音难习，教之当以七八岁为始，殊不知七八岁则晚矣，非从襁褓中则莫之能也。”可见，他们已经由经验认知到了语言学习的年龄因素。

唐通事们学习的是南方音，这跟到长崎进行贸易的中国船的来源地密切相关。由于通商的对象地区是长江下游一带至福建为中心，所以他们的中国语发音（即唐音）不是北方的发音，而是南方音。唐通事的唐话，有南京口、福州口、漳州口等，所谓口就是用口说的话，也就是说，唐通事的唐话包括多种中国南方的方言。下面我们从语音、词汇和语法教学等角度进行具体阐述。

第一，语音教学。为了训练唐音，学生要到海边大声地苦练，这种大声的发音训练，滚滚而来的波涛声压不住，劲吹的寒风也催不垮。另外，在区别送气声和不送气声时，他们以掌上的灰是否飞起来作检验。后者跟现在用纸片是否颤动来检验送气和不送气的方法如出一辙，这种语音教学方法比较直观，便于教学演示和教学效果检验。但是，由于当时的《唐话纂要》等教材的标音方法不太准确（用片假名来注音），如果老师的相应发音也不准确的话，则很可能会“以讹传讹”，再刻苦的练习也没用。

第二，词汇教学。当时已经有了丰富的词汇学习方法。比如《唐话纂要》的词汇选编就很有特色，如：设置专门的词汇板块进行教学，词汇的学习包括了“词”“词组”和“语”等丰富的内容，以及词汇教学的渐进性、词汇按语义归类编排、同字词相邻编排的无意识的语素教学思想和

¹⁵ “训读法”产生的时间大约是9世纪，即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以后，日人无法学习唐音，只好采取训读这样的变通方法。这是名古屋外国语大学中钵雅量教授告诉笔者的。

¹⁶ 安藤彦太郎著，卞立强译，《中国语与近代日本》，页5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以故事(语境)发展为序编排词语等等。下面介绍一下《唐话纂要》中以故事(语境)发展为序编排词语的特色。当时的词语编排不可能像今天一样主要根据词频去选排。《唐话纂要》的词语编排是否有某种规律性呢?选编过程中,冈岛冠山¹⁷也许想到哪个词就写哪个词,编排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随意性又有冈岛先生其个人词库的排序特点,是其自身词库顺序的自然反映。这样说并非凭空猜想。因为其中的词语根据同字联想、近义反义联想编排的特点非常明显,甚至还有根据语义(事情)发展的顺序自然延伸词语的现象存在。下面以第15页的“二字话”为例说明。

赴筵 丰筵 请客 招客 邀客 请坐 请上 上来 上坐 平坐
宽坐 端坐 请宽 跪坐 闲坐 坐下 笑谈 闲话 晤语 相语
说话 讲话 清谈 玄谈 告别 告辞 起行 起程 动身 起身

《唐话纂要》按语义(故事)发展顺序编排词语的现象虽然不太普遍,但其存在是无疑的。现抽取上述“二字话”中的一些词语并按顺序排列如下:“赴筵—招客—请坐—上坐—坐下—笑谈—告别—起身”,联系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场景,客人“赴筵”,主人“招客”,客人“请坐”,而且是“上坐”,“坐下”后一起“笑谈”,最后“告别”,客人“起身”回家。这些词语,学习者完全可以通过联想的方法进行记忆,甚至还可以将这些词语连词成段,进行语段会话练习。语言环境清晰,词语充分,练习起来应该得心应手。不过,类似这样比较连续的场景在《唐话纂要》中不多,但场景上具有连续性特征的四五个词语一起出现还是很多的。所以,虽然冈岛先生未必是有意为之,但无意中却开创了以故事(语境)发展为序编排词语的先河。¹⁸

第三,语法教学。就现有资料来看,当时还没有什么专门的语法教学。

总而言之,唐通事们的教学多从经验出发,既没有发音教学理论的指导,也没有语法教学。当然,我们不能用今人的标准去苛责他们,而应该用历史的眼光予以客观的评价。不过,这样的审视却告诉我们:唐通事们使用的汉语教材仍带有浓厚的汉语母语教材的色彩,离科学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还有相当的距离。

4. 使用的汉语教材

前面我们对《唐话纂要》等教材已经作了一定的分析。那么,唐通事们在学习的不同阶段各自采用何种教材呢?从唐通事的教科书来看,是从所谓“二字话”、“三字话”的单词、短语入门,

¹⁷ 冈岛冠山(1675—1728),名璞,字玉成,号冠山,长崎人。他是日本江户时代一位著名的唐话教本编纂者,编有《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话使用》、《唐音雅俗语类》和《经学字海便览》等多部汉语教本。他还是日本最早将《水浒传》翻译成日语的学者之一,此外还编译了《通俗皇明英烈传》、《太平记演义》和《明清军谈国姓爷忠义传》等多部中国小说。

¹⁸ 详见拙文“《唐话纂要》的词汇选编思想探析”,未刊稿。

然后进行所谓的“闹里闹”的问答，¹⁹接着是学习《今古奇观》、《水浒》、《聊斋志异》等，可以看出是一种遵从父子相传的技艺精神的高级技术教育。²⁰

从教学顺序来看，“唐通事最初为学习发音先要用唐音读《三字经》、《大学》、《论语》、《孟子》、《诗经》等，然后是学习语学的初步即恭喜、多谢、请坐等两字句，然后是好得紧、不晓得、吃茶去等三字句，然后是四字句及更长的长短句。其教材有《译词长短话》五册等。此外还有《译家必备》四册、《养儿子》一册、《三折肱》一册、《医家摘要》一册、《二才子》二册、《琼浦佳话》四册等唐通事参与编辑的抄本。毕业后还要跟随老师读唐本的《今古奇观》、《三国志》、《水浒传》、《西厢记》等。然后还要自学《福惠全书》、《资治新书》、《红楼梦》、《金瓶梅》等，有问题时可向老师咨询。”²¹由易而难、由简而繁，遵循了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虽然上述教材带有不少中国汉语母语教育的痕迹，但由于已考虑到外国人学习的特点，所以可以将其归入汉语第二语言教材一类，它们跟当时中国国内西方传教士仍然使用中国人母语学习的教材相比，要先进一些。此外，《译家必备》也是唐通事学习用的课本：《译家必备》共4卷4册，内容先是见习通事刚到通事会上上班，向前辈们作自我介绍，然后分别是唐船入港、唐船的商品交易、唐船员到长崎市内逛街、唐船出港等，总之，都是唐通事实业务所需要的。²²该教材跟前述的传统教材有很大不同，其内容非常实用，说明该教材的编写者已注意到语言“交际性”功能，唐通事们学完以后基本上可以应用，真是名副其实的“译家必备”。

三 对日本汉语教育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影响

1. 对江户时代及以后汉语教育的影响

唐通事的汉语教育活动，作为江户时代一种主要的汉语教育形式，有效地促进了日本的汉语教育和汉语学习活动，长崎也因之而成为当时日本汉语教育的重镇。此外，他们的教学实践和教材编写等活动，不仅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唐通事的继承人，对后世（尤其是明治时期）的影响也意义深远。他们对江户时代以后的汉语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师、教材和教法等几个方面。明治时期的汉语教师大都有着唐通事的背景或渊源。“近代中国的中国语教育，因为有二百六十多年唐通事唐话教育的经验与传统，所以明治的汉语教育，从一开始就一点儿困惑也没有，并且，教师丰富的知识反映在了教学中。”²³日本正规的最早教授中国语的学校是1871年创立的汉语学所（后

¹⁹ 《闹里闹》也是一种启蒙性的初级唐话教本，它采用的是问答体形式。

²⁰ 安藤彦太郎著，卞立强译，《中国语与近代日本》，页53-5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²¹ 六角恒广著，金满生译，论唐话教本，原文载《语学研究论丛第10号》，日本大东文化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1993，译文未刊。

²² 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页2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²³ 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页291，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发展为今天的东京外国语大学), 该所的教师包括教务主任颖川重宽在内, 都是江户时代长崎的唐通事出身。教材和教法也都是沿用唐通事时期的, 尤其是在初期。安藤彦太郎在论及明治后期善邻书院的创立者宫岛大八的“宫岛派”教授发音的方法时指出, 他们“有很深的渊源, 传说唐通事的教学方法也是把炭盆里的炭灰放在手心里练习。”²⁴也就是说, “宫岛派”教授发音的方法是从唐通事们那儿传承来的。

2. 语言学习的同时传播了中国文化

虽然唐通事们多为谋生而从事此一职业, 但客观上却推进了汉语言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他们的任职唐通事, 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解决了个人的‘稻粱之谋’, 更重要的是为汉语汉字不绝如缕地在日本使用和传播创造了一种条件和可能。”²⁵比如, 他们的汉语学习活动大大促进了中国白话小说在日本的传播。江户时代编写的一些汉语教材, 大量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词句和故事, 作为其教学内容。“著名的冈岛冠山编的《续俗文音译》七卷, 是当时用于学习汉语口语的一部重要教材。该书卷一至卷三以一般常言为内容, 称为‘长短杂话’。其中的内容全都是从中国明清俗语小说中选摘出来的, 每一条都有日语对照, 是一种口语对译的手册。该书卷四和卷五‘长短话’中的标题小故事, 以及卷六的‘与人说故事’, 其内容更几乎全是从中国明代‘三言’小说中改编和缩写的, 其作用犹如现在外语教学中的讲读材料。”²⁶阅读中国明清俗语小说是培训唐通事会话的重要手段。雨森芳洲说:“或曰学唐话, 须读小说可乎? 曰可也。”又说:“我东人欲学唐话, 除小说无下手处。”²⁷江户时代以这样的方式来培养“唐通事”的语言能力, 同时又不自觉地将中国明清白话小说引入日本。当然, 中国明清白话小说传入日本还有别的甚至更主要的途径(比如大量的汉籍流入日本), 但这种唐通事们学习用的简易读物或许更利于一般阶层接受和传播, 其作用不容小觑。

《唐话纂要》的最后是“小曲”部分, 现摘出两小节:

崔莺 崔莺莺, 访红娘, 我有问上一个详细。街坊上, 许多人, 讲我的是非。是何人? 造下了我有这本的西厢戏。草桥惊梦何曾有? 月下佳期在那里? 何人叫做张生了, 红娘, 那个跳在我花园里。

张君 张君瑞, 访故友, 游学得散闷。往浦东, 访杜曲, 白马将军偶游到。普救寺, 武则天娘娘的建造, 大雄宝殿, 高六丈, 钟鼓楼台高又高, 久闻那宝刹洁净。有有一位高僧老师台,

²⁴ 安藤彦太郎著, 卞立强译, 《中国语与近代日本》, 页 60,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²⁵ 董明, 《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年。

²⁶ 严绍璁,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 页 57-58,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²⁷ 严绍璁, 十七—十八世纪日本人汉语习学考略, 见李向玉、张西平等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第一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澳门理工学院, 2005 年。

借居西厢，闲游戏耍²⁸

这两小节都来源于《西厢记》。唐通事们在语言学习的同时，对中国的一些传统的通俗的戏曲故事有了一定的接触。也可以说，在阅读这些戏曲故事的过程中，唐通事们不知不觉学习了语言。如果用现在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来分析，这就涉及到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问题。笔者以为应加强文化内容的教育，特别是对于国外的汉学系和东亚系的西方学生来说，加大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教学是有必要的。“只有加大文化教学或在语言教学中突出文化内容，才能使我国国内的汉语教学和国外汉学系的教学有所衔接。”²⁹将汉语的学习只停留在单纯的语言层面和日常生活层面，所掌握的汉语必然是苍白的、没有深度的，对中国的认识也只能是表面的、肤浅的。关于唐话学习及学习过程中中国白话小说的翻译对日本的影响，安藤彦太郎的有关描述则更为详细：

通过在“译社”³⁰学过唐话的人们的手，陆续地翻译介绍了中国的白话小说。这些小说投好当时城市市民的喜爱，给说书、笑话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儒家们插手了这些四书五经的小说——即所谓的软文字，所以也影响了当时的日语的文体，从江户的游戏文字的作者一直到明治的文学家的文体都适当地夹杂着白话的词句。如二叶亭四迷的《浮云》等很多小说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夹杂着白话词句的文体。不仅是文体，在森鸥外的作品中也出现了一板正经的汉学先生的桌子底下偷偷地藏着一本《唐本“金瓶梅”》之类的情节（如《我的经历》中的文渊先生）。³¹

通过学唐话者对汉籍的翻译介绍，不仅给日本社会的说书、笑话带来了影响，而且还影响了当时的日语的文体，甚至影响了日语小说的某些具体情节，可见影响非常之大。

四 余论

除了唐通事外，江户时代传授汉语的还有一些由中国东渡的僧人（如来自福建的日本黄檗宗始祖隐元法师）、思想家（浙江余姚的大儒朱舜水）及儒士（沉燮庵）等人。此处不赘。

总体而言，与几乎在同一时期的西方来华传教士面对重重困难仍执着于汉语学习的热情相比，³²江户时代的日本，即使有唐通事这一职业的存在，汉语学习仍然是冷清的，并没有出现“汉语热”，

²⁸ 冈岛冠山著，六角恒广编，《中国语教本类集成补集：江户时代唐话篇第一卷 唐话纂要》，页 236-238，日本不二出版社，1998年。

²⁹ 张西平，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简述，见《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³⁰ 正德元年（1711），获生徂徕启用了著名的唐话学者一冈岛冠山，开设了名为“译社”的唐话讲习会。

³¹ 安藤彦太郎著，卞立强译，《中国语与近代日本》，页 5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³²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在其回忆录中有一封信是写给他的上级，建议训练中文译员以便继承他的工作的。他写道：“学习中文的首要困难是来自中国语言和文字的特性；其次是要能找到好的老

尤其是将汉语作为外语的“口语学习热”，但也不可否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语言文化间的交流，促进了日本人对汉语的理解，促进了中国白话小说在日本的流播。

**Tang – translators in Edo period and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ZHU Yo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nstitut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Japanese were prohibited from navigation overseas during Edo period, thus Tang-translators emerged. Tang-translators, as the mediator of exchange, are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ang-translators' main duty was or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ir social status were not prominent albeit what they had done in the history of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ang-translators' learning of Chinese were family-bound, practically motivated, empirical in learning methods, --- scientific to some degree, but a long way from a really scientific method for learning Chinese. Tang-translators widely affecte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uring Edo period and afterwards. Their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language unintentionally facilitated the spread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Edo period, Tang-translators, Chinese language

师，有能力教授外国学生用中文和老师对话和能书写中文；第三个困难是中国人对外国人有疑惧心。你必定很清楚，中国政府是绝对禁止任何中国老师教授外国人中文的，而中国人，一部分是出于恐惧，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嫉妒心，很少肯同外国人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全学会中文，除非有强烈的动机推动，或出于好奇、感到有兴趣，或出于虔敬，否则这是一桩令人厌烦的事情。……中国老师要冒着生命危险才敢来教中文……”。见马里逊夫人，《马里逊回忆录》，页 10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